

論 点 摘 編

公共政策制定的社会风险评估

张红显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撰文指出,风险社会的到来对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提出新的挑战,所有的公共政策制定都是风险面向的。通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来防范和化解政策制定带来的制度风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和战略选择。将风险评估纳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促进了公共决策过程向公众的开放,对于推动政府公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实现政府治理层面的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政策制定中最大的风险乃是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性不足,即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公共政策制定偏离公共性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潜在风险,公共政策制定价值取向偏离公共性的可能风险,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构成上公共性或缺的可能风险。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制定偏离“公共性”的社会稳定风险源自不受限制的部分政府部门绝对权力的可能异化,具体的体现是公共权力的可能非公共运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法律化、完善公共政策决策责任机制是确保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共性”、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源头治理的关键。

从智力吸纳到协商共识: 中国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性

韩万渠在《学习论坛》2019年第2期撰文指出,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治理亟须技术专家的科学知识和经验提供

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撑,形成以技术专家为主的智力吸纳阶段;中央顾问委员会及省级顾问委员会撤销,退休官员失去作为政治顾问影响政策的平台,转而选择加入决策咨询委员会,国家治理对社会建设、依法治国、生态建设等领域的重视,使得政府吸纳上述领域的专家进入决策咨询委员会,形成各领域专家主导的多元智力吸纳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后,地方政府探索将社会咨询委员会等公众参与模式整合进决策咨询委员会,形成以共识为导向的协商民主模式。政府决策体制由内部化逐渐开放至专家学者,进而拓展至社会精英群体,并尝试与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结合。而民意代表为主体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出现,则表现出决策体制的进一步开放,使得决策咨询由“智力吸纳”经历“精英吸纳”后转型为“多元协商”。这一过程折射出中国地方政府决策体制的渐进开放性。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张合林、都永慧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撰文指出,空间要素、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生态环境、政策制度等六个因素与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之间呈双向互动关系,其中,空间要素、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与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高度相关;文化教育和政策制度因素与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影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是社会一体化水平,其他五个影响因素则显著相关。因此,提升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就需要从空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制度等六个方面加强措施:一是合理调控城乡空间结构,促进城乡空间一体化;二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推进城乡经济一

体化发展;三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四是营造城乡交流的文化氛围,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五是确保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六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驱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人口集中、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作用

李恒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撰文指出,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核心,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解释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就业,单一城市和城市群在吸引人口实现就业转变方面存在差异。城市群这种城市形态内部经济联系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越成熟的城市群其内部经济联系越密切。与此同时,城市群内部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的影响,城市化率、消费等也是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其一,政府应加大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城市间资源和功能的整合,提高城市群一体化程度,培育共同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发挥城市群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其二,引导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应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以城市的功能和服务来促进城镇化的过程,避免单纯土地和户籍的城镇化,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同效率。最后,在城市群的结构上要合理发展,防止单一城市过度扩张和有序蔓延带来的拥挤效应,降低集聚不经济的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王杰、段瑞珍、孙学敏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撰文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延长参与全球价值链持续时间有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第一,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打好全球价值链升级中最重要的技术提升基础。第二,企业在提高工艺技术水平的同时,要进一

提升研发设计、营销、售后、品牌等服务要素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功能转型升级,进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增强企业对价值链链条的主导权,降低企业退出全球价值链的风险率。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途径,在进一步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全球竞争能力的同时,要鼓励中西部地区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全球竞争,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不断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这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贸易结构、行业结构与制造业出口商品的技术升级

任太增在《江汉论坛》2019年第2期撰文指出,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有效互动是实现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条件,而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是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呈现出高度化、合理化的发展趋势,金融危机倒逼推动的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升级效应逐步显现,但是出口结构的升级并不等同于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经济增速放缓区间,我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化、技术结构高度化的趋势受到抑制。而且,我国制造业的贸易结构与其行业结构存在显著偏离。因此,对于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而言,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要比技术模仿更有效,至于自主创新的方向,在构筑核心能力的过程中,着重培育技术能力的异质性尤为重要。

乡村振兴必须实现小农户的振兴

沈琼在2019年4月19日《河南日报》撰文指出:小农户经营是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特性所决定的,是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因此,乡村振兴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就要实现小农户的振兴,让占农民群体大多数的小农户享受更好的发展和福祉。小农户振兴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二是资金、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占有不足。三是市场、效率缺乏。实现小农户振兴要把握三个基本方向:一是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一方面,要组

织引导和帮助扶持懂农业、爱农村、有实力的人才返乡创业。另一方面,要做好大量农业就业者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的顶层设计,避免中青年劳动者、高端人才过度转移。二是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农民增收要更多地依靠农业和农村,通过农村产业振兴和资源激活,充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活功能、休闲功能、景观功能、示范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多维延伸。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使更多小农户能够在融合的过程中分享到农业全产业链增值后的更大的收益。三是提升小农户服务规模化程度。要通过股份合作、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等多种途径,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引导和组织小农户通过土地入股、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相互合作,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借助互联网平台,将分散的小农户联合起来,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实现小农户与多元市场需求对接。以农户的组织化、服务规模化带动经营规模化,破解小农户自身存在的资金与先进技术不足难题、与市场对接难题,为小农户提供生产性服务、经营性服务和金融性服务,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最终实现农业资源及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农村产业兴旺。

20世纪初河南城市化启动的主要动力

谢晓鹏在《史学月刊》2019年第1期撰文指出,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河南城市化进程正式启动。其动力机制包括三个层面:西方资本、技术和商品的输入是其外部动力,清末河南社会变革是其内部动力,两者合力作用下的近代工业化则是其根本动力。近代河南城市化,是在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下艰难启动与曲折发展的,并呈现出如下一些突出特点:一是近代河南城市化起步晚于沿海、沿江地区,但又早于西北内陆地区,在整个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的传递作用和过渡性质,即充分利用其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不断将近代城市文

明和城市化成果由东南沿海地区传向西北内陆地区;二是近代河南铁路交通相对发达,其主要城市大多分布在铁路沿线,铁路运输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较别的省区更加显著,这也导致近代河南城市化的发展对铁路交通的依赖较重,铁路通则城市兴,铁路阻则城市衰;三是受农业人口众多、农作物产量低、工业资金匮乏、灾害战乱频繁、思想观念保守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近代河南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城市化水平始终较低,尤其缺少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这一局面长期没有得到明显改观,严重制约了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文学交流叙述中的价值实现方式

王委艳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撰文指出,文学交流叙述的价值实现首先必须建立在交流参与者平等的基础之上,平等的交流框架是意义有效性的前提。叙述合理性来源于符号组合意义的方式,它遵循多元逻辑,每种逻辑均会包含人类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主题剥离与主题附着是根据交流参与者所要达到的交流目的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无论采取哪种主题方式,均是为交流价值的正确实现而做出的交流姿态。道德伦理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是文学交流叙述中的两种重要价值,其价值实现存在于文本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但叙述话语很多时候占主导,并且两种价值的实现是交流各方共同参与磨合的结果。

中国传统礼仪用乐政治功能

宋文杰在《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撰文指出,礼仪用乐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配合国家礼仪的奏乐形式,表现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构成形态。作为一种具有较强实践性的艺术形式,其在仪式中通过与仪式的展演相配合以达成特定的政治功能,具体表现为通过历史记事的方式再现统治者的政绩,通过乐舞使用方式、规模等确认仪式举行者身份,此外还具有协调宗族及统治阶层内部关系的作用。